

理论案例汇编

(内部教材)

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

2003年10月

·北京·

乙
本

理论案例汇编

(内部教材)

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

2003年10月

·北京·

说 明

理论案例教学是党校研究式教学的一种形式,是课堂教学的补充。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学员普遍感到它是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同时也对《理论案例汇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教学需要,分校组织有关教师对《理论案例汇编》进行了重新编纂。

本次选编除保留了原有的3篇案例外,其余十多篇都是新案例,涉及党的思想路线、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风廉政建设等多个方面。我们希望学员通过阅读和讨论,能够对案例进行由事入理,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由历史到现实地深入分析和思考,从而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论案例汇编》仅作为内部教材使用,请学员注意保管。为了适合案例教学的需要,我们在保持原文基本观点和风貌的基础上对所选文章进行了部分删节和改动,因条件所限,未能一一征求原作者意见。我们尽可能地在文章后面注明了出处和原作者。在《汇编》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领导和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领导的关心与支持。部分学员也积极推荐了案例。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因时间和经验有限,内容文字难免有误,不足之处,希望党校工作者和广大学员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案例编写组

2002年11月15日

目 录

让思想冲破“模式”的思考	(1)
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	(11)
中央政策汇编为何成了禁书	(17)
中国依法罢免村官第一案	(22)
集体讨论为何“走板”	(28)
入世谈判十五年	(32)
“新百万富翁”是如何产生的	(39)
“冯根生难题”	(45)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48)
万人评议与末位淘汰	
——南京市机关作风评议纪实	(57)
从“屠宰办”现象看“有形之手”变形	(63)
通化市部分干部“跳槽”民营企业现象透视	(66)
附件1 对领导干部“跳槽”民营企业的几点思考	
附件2 正确对待机关干部“跳槽”民营企业	
胡长清是怎样堕落的	(77)
南丹透水事故是怎样被隐瞒的	(81)
透视运城渗灌工程	(87)
“海选”平息三村乱	(93)
“官逼民富”招民怨	(98)
山绿了,眼红了	(104)
人民币汇率	(110)
中国金融的机遇和潜伏危机	(115)

让思想冲破“模式”的思考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若干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它们曾经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过一定的示范作用。但一些地区在学习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出现了固守、盲从“模式”的倾向,束缚了思想,造成负面影响。包括苏州市在内的苏南地区最近总结经验教训,反思“模式”问题,提出了“不要模式,要与时俱进”的口号。希望本文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上) “模式”难以解释现实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苏南模式”曾在国内产生过很大影响,一些地方纷纷效仿。但记者最近在“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的苏州市采访发现,这里人们的“模式”意识已经淡化。当地干部群众认为,过去的“苏南模式”已不能解释今天苏南发展的现实,更不用说靠它来指导今后的工作!

“苏南模式”难以解释苏州新亮点

所谓“苏南模式”,其公认的核心内容一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一是以乡镇工业为主。在 20 世纪 80 年代,苏南曾兴办了数以万计的乡村集体工业企业,它极大促进了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反过来又推进了农业现代化。

“苏南模式”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对苏南人来说,那早已成为历史了!以苏州为例,近 10 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崛起成为 GDP 高居全国城市第 6 位的大城市,这主要靠的不是乡镇集体工业,而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开发区。

10 年前,苏州虽然有上万家乡镇企业,但规模小、水平低、名牌少,主要分布在丝绸、纺织、轻工等传统工业领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靠的是数量的扩张。

今天的苏州,是全球最大的电脑鼠标生产基地,鼠标产量占世界市场的

65%；电脑显示器、扫描仪、水晶振子占了全球市场的20%以上；笔记本电脑、电脑主机板的产量也在世界上居于重要地位。三星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微波炉、诺基亚手机、AMD芯片、富士通数码相机……大批驰名世界的产品从苏州销往国内外市场。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型家电、精细化工以及石化、新材料及基础原材料、汽车及汽车配件，这6大新兴产业已成为苏州新的支柱产业，并且几乎都由外资企业组成。在苏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635亿元销售产值中，6大新兴产业占42.3%。新兴产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规模大、水平高。比如电子信息产业，虽然只有86家企业，但销售收入却高达557亿元，占全国同行业的5%以上。

10年前，苏州市基本没有开发区。10年来，苏州人兴办了5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个省级开发区，累计建成区面积已达190平方公里。这些由城市扩展而成的开发区，已成为先进生产力高度聚集之地和拉动苏州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头，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已达357亿元，相当于在经济上再造了一个新苏州！

“苏南模式”也难以解释今天的苏南

苏州市以及下属的张家港、常熟、昆山、太仓、吴江等地的永联钢厂、康博服装公司、永鼎光缆集团、艺龙印染公司、鹰翔丝织厂等一批乡镇企业的老总们普遍认为，即使对乡镇企业而言，“苏南模式”也已不再适用了。

永鼎集团董事长顾云奎说，当年苏南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兴起，与当时苏南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不无关系。一方面，苏南历来是鱼米之乡，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农业基础较好，经过建国以来近30年的积累，乡村集体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强，1978年，全苏州仅生产队（组）一级拥有的集体资金就达2.15亿元，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资金实力；乡镇干部素质也相对较高；另一方面，这里紧邻上海，借助上海的技术力量比较容易。当时有句话叫做“无工不富”，几乎只要有钱开工厂，就能赚钱。

顾云奎说，创业之初，他的企业只有2万元资金、13位农民工、3间破瓦房、1台吹塑机，生产的产品是塑料袋、塑料眼药水瓶、蓄电池隔板。一年下来，创出产值15万元、利税2.8万元，还置下了6.9万元的固定资产。10年之后，企业资产又增加了100多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结束，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普遍走入困境。规模小、技术水平较低的乡镇企业的产品不再好销，而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单一,经营体制日益僵化,“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的灵活机制变成了“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高不能低”的“小全民所有制”。政企不分,使许多乡村干部为求政绩,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惜大量贷款,利率高达20%左右,全市乡镇企业负债率高达80%。多数企业的利润不足以归还贷款,大量亏损,举步维艰。

苏州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徐伟荣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市如果没有大批外商投资企业的创办,没有十几个开发区的涌现,仍旧依靠乡镇集体工业的话,绝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兴旺局面。换言之,如果继续沿着“苏南模式”的道路走下去,只会是死路一条!

“苏南模式”难以概括苏南经验

徐伟荣对记者说,不少外地干部之所以对“苏南模式”感兴趣,主要是希望能从中学习苏南地区近20多年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验。可是,以苏州为例,其发展经验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绝不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工业为主”就可以概括的。

除了经济发展,苏州市的精神文明、教育、文化、卫生、环保、体育、计划生育工作也很有特色。在苏州,人们看到的是亦中亦洋、兼容并包的文化,它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支持作用。

如今的苏州,古城居中,其东、西两边分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密集的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新区,正是这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一体两翼”的城市格局吸引了无数外商。许多从广东迁往苏南的台商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从“珠三角”迁往“长三角”的原因,就是看中这里的传统文化和人口素质。“九五”期间,苏州市仅普通教育的投入就高达70多亿元。目前,全市初、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分别高达95%、85%,全市已有省级以上重点学校、实验学校近100所。乡镇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都有电脑室。现在,苏州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12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在苏南,外商投资企业招收工人的最低标准是“高中文化”。

充满理性和文化气息的环境,也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在安定、和谐的环境里,苏州外商投资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

徐伟荣说:“许多人到苏州学习‘苏南模式’时,总感到学不像。如果仅仅把苏州这种综合经验简单化为‘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工业为主’,怎么可能学得像?”

(中) “模式”不能束缚发展

模式是人创造的,当然也可以打破。苏州人常说,正因为冲破了“苏南模式”的框框,才有了苏州如今的兴旺局面。

戴着“模式”的枷锁起舞

苏州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徐伟荣告诉记者,在江苏,尤其苏州,“苏南模式”的确曾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也使“苏南模式”变成枷锁。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江苏,在苏南,许多人认为只有“苏南模式”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大搞个体私营经济的温州则是资本主义,苏南是“社会主义的南大门”。在苏南农村,只要不是集体经济、乡镇工业,党政部门普遍采取抵制的态度。对农民自办的家庭企业,即使没有明令禁止,也绝不支持。

在常熟农村,早在1984年就已有4000多个家庭服装厂,有的私营企业已发展到较大规模,可当地政府就是不予承认,不纳入统计口径,甚至不给工商登记。在张家港市妙桥镇,20世纪80年代农民家庭羊毛衫厂发展很快,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有100多个摊位的小型市场。市里发现后,立即派了一个由8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来查处。当地群众说:“八国联军来了!”工作组一走,市场重新红火起来。市里再次派来10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群众说:“多国部队来了!”工作组撤走后,市场又恢复了。这样的故事在10年前的苏州也屡屡发生。直到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到了1995年、1996年,苏州的私营经济才基本上得到了承认。

徐伟荣说,苏南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工业,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它是苏南农村干部群众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发展生产力的壮举,而集体经济又是当时可行的选择。遗憾的是,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把它不恰当地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并当成一种理念的追求,人为地限制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致使苏南私营经济的发展至少比浙江落后了5至10年!

“模式”禁围不住发展欲望

虽然私营企业长期在苏南受到排斥,但是对于乡镇集体企业僵化机制的失望,对于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以及温州等地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榜样,使苏南一些地区的乡村干部和企业家勇敢地走上了发展私营企业的道路。

地处苏南最南端、与浙江省交界的吴江市盛泽镇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几个最穷的村开始学习邻近的浙江,搞起了私营企业。当时担任镇党委书记、现为吴江市副市长的吴海标说,对此,镇政府领导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由于怕上级出面制止,镇里为这些私营企业冠以“集体”名称,用“红帽子”伪装起来。

吴海标说,当时之所以那样做,实在是迫不得已。原有的工资、奖金已经很难调动乡镇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因为即使是比工人平均工资高 5—10 倍,也还是与许多企业经营者所做的贡献不相符。有的企业负责人为求心理平衡,开始在经营活动中拿回扣、做假账。虚报亏损,集体资产客观上不断流失。另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不少企业经营者已拥有了几十甚至几百万元的个人财产,具有了租赁企业甚至购买企业的能力。于是,从 1992 年起,盛泽镇有计划地对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由村到镇逐步推开。

1996 年,盛泽镇红安村的红安丝织厂承包厂长陈克勤打算淘汰厂里的有梭织机,更新为箭杆织机,由于企业产权属于村里,他无权决定这样大的事,就提出把厂子卖给他。正好那时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盛泽镇便为这家工厂名正言顺地挂起了私营企业的牌子。1997 年夏天,镇政府组织人员,对全镇 370 多家大小明里暗里的私营企业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然后光明正大地为他们办理了营业执照。到 2000 年,盛泽镇几乎所有丝绸企业都从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营企业。盛泽镇政府工业公司副经理沈莹宝告诉记者,私营企业比集体企业的效率高得多。如拥有 11 台喷水织机的私营企业汉通喷织厂,一个厂长就把所有行政事务干了,而同样规模的集体所有企业,一般需要 20 多个行政人员。现在,企业的生产、销售、技改,甚至劳资纠纷,基本不用政府操心。

盛泽镇私营企业的发展走在了苏州的最前面,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实惠。从 1999 年以来的 3 年中,盛泽镇丝绸业依靠私营企业的资金,新增投入 50 亿元,新增项目 323 个,使全镇丝绸产业规模扩大了一倍!今年初,这个镇 40 余家私营丝绸企业一次性向日本丰田公司购买了价值 5 亿多元的 2500 多台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 JAT610 型喷气织机,这是丰田公司 76 年历史上最大

的一笔织机订单。镇政府的人说,光靠政府是不可能担起这么大风险的。

由于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抓住了发展私营企业的先机,以丝绸产业驰名于世的盛泽如今不论是产业规模,还是设备、技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再次获得了历史上曾有过的“绸都”美誉。

另辟蹊径者的巨大成就

在苏南,有一个不搞“苏南模式”也取得巨大成功的,这就是昆山市。

在苏南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昆山市依仗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仍旧留恋传统农业,错过了发展机遇,没有搭上“苏南模式”这班车,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大大落后。然而,正因如此,反而逼迫昆山人另辟蹊径,找到了成功发展的新路。

1984年,昆山人得知中央准备在沿海地区兴办一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便积极争取。但对当时的昆山来说,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地位都远远不够。然而,昆山人认准了发展工业这条路,就是上面不给钱,自己想办法也要做。

昆山开发区最早的一步就是与国内其他地区企业的“横向联合”:利用昆山与上海接壤的区位优势,从外地引进了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内资企业。地处贵州高原、急于在东部沿海地区开“窗口”的航天部风华冰箱厂到昆山建立了“风华冰箱厂昆山分厂”;上海电视机一厂、苏州刺绣童装厂随之来这里建分厂。很快,这样的分厂就建起了13家。当一批打着“昆山”标记的优势产品纷纷闯进市场的时候,令邻近县、市大为震惊。因为他们断定一个小小昆山县的工业生产水平决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提高!

昆山开发区自筹开发经费的第二招更加大胆:利用外资。在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明,但在1984年,日资企业“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却是整个苏州的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今天,昆山市引进外资的规模 and 水平是令人惊叹的:累计批准建立外商投资企业2300多家,合同引进外资120多亿美元,外资实际到位50多亿美元。其中,累计利用台资占全国十分之一!台湾10大笔记本电脑企业中有8家到此落户。

1989年,昆山又在全省率先进行土地有偿出让,所得资金注入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赢得了基础设施的高水平、高质量。1992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承认了昆山开发区的“国家级开发区”地位。

1984年的昆山,即使在苏州市下属的6个县(市)中,也是最后一名。去年,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昆山市名列第3位。在江苏省的县(市)

中,昆山的人均 GDP、出口总量、利用外资总量均居首位。

(下) 抛开“模式” 与时俱进

对“苏南模式”的创造、运用、怀疑、突破和放弃的过程,也使苏南人深切感受到,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热衷于所谓的“模式”,千方百计修补“模式”,绞尽脑汁为“模式”自圆其说的做法,早已经过时。只有根据各自条件和不断变化的实际,兼收并蓄,才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模式”究竟是什么?

苏州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徐伟荣认为,所谓“模式”,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特征的“经验”。提出“模式”的主要目的是为学习者提供榜样。本来,各地之间互相取经十分有益,然而,一种经验一旦上升到“模式”的地位,却往往容易僵化。

在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即使在一个省内的各个市,一个市内的各个县,用“模式”来强求一律也是行不通的。多样性是市场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徐伟荣说,不可否认,“模式”是创造的产物。“模式”的创造者都是首先打破了旧有“模式”,才创造出了新的“模式”。否定“模式思维”,并不是否认以往“模式”的历史功绩。“苏南模式”本身,就是包括苏州人在内的苏南人为求经济、社会发展,大胆冲击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的,它的正面作用毋庸置疑。可是,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它永远正确,处处灵验。正如世界闻名的苏州园林,以“假山假水”为特色,使人“不出闹市而得山林之趣”,可是如果将苏州园林搬到真山真水的九寨沟,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另外,否定“模式思维”,也并不意味着连“模式”一词也不能再用了。所有“模式”,都只能是事后总结,不能事先预定;只能聊作参考,不能盲目照搬。否则,不是邯郸学步,就是刻舟求剑。

兼容天下经验

没有一个地区的资源是全面的。同样,也没有一个地区的经验是全面的。就苏州而言,之所以能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地位迅速上升,其重要的成功之道就是善于借用外地的物质、智力、经验、资源,为现实经济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人发现,许多令他们今天感到自豪的东西都是外来的。在苏南乡镇企业起步之时,是大批来自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周末厂长”、“兼职推销员”,对苏南农民进行了工业化的启蒙;昆山开发区启动之时,没有资金、技术,是一批来自西南军工企业的“窗口企业”为他们撑起了最初的门面;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初期,是来自深圳、天津等特区和开发区的经验给他们上了第一课;7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为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和就业机会,帮助他们极大提高了经济国际化水平。

如何与国际经济接轨,国内没有现成经验。可苏州人却在海外“借”来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新加坡经验。1994年启动的苏州工业园区,大胆借鉴新加坡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成套经验,使苏州不仅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世界一流,而且在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直接逼近了国际一流,少走了许多大城市走过的弯路。

近几年,苏州人发现,苏州经济有一条明显的“短腿”,这就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不多。苏州长期是中等城市,本地缺少一流的科技院所、高等院校,企业技术创新迫切需要的科技支持不易从当地获得,而依靠国外资本带来国际一流科学技术,也只能是短期的。为此他们决定,办好已有的高校、院所,同时向全世界引进智力资源。

近5年,苏州先后成立了8个“企业孵化器”,吸引了280多名出国留学人员,创办了150家留学人员企业。从1998年起,市政府又连续3年承办了由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全国科技成果交易会。本地骨干企业与中科院的51个分院、研究院、所和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同国内各大高校建立了200多个相对稳定的产学研联合体。

一个地区无论多么发达,也不可能事事依靠自己!苏州人说,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功,全世界都出了力!

重在为我所用

学习别人的目的是为我所用。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的苏州人,如今不管汲取什么经验,都不全盘照搬,都要加以改造,力求出新。

比如苏州工业园区,最初是相当完整地借鉴新加坡的开发经验,并因此大获成功。但随之问题也出现了:中方与新方合资的园区开发公司由于战线过长,前期投入太大,除了土地开发以外其他收入来源较少,开业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虽然对于一个长期项目来讲属于正常情况,而且初始的亏损对整个园区的建设并没有根本影响。但是,从2001年起,中方在取得公司控股

权之后,就根据具体情况对公司的开发步骤进行了修改,以便扭转公司亏损。

一方面,他们将土地开发方式转变为滚动开发,即不让土地开发过分超前,而是将土地开发进程与招商进程结合起来,适当超前一些。这样,大大减少了基础设施投入占用的资金,减轻了贷款利息负担。另一方面,公司利用已经开发完成的首期开发区优美环境的吸引力,专门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从事房产开发,取得了极佳的经济效益。到去年底,公司收支已基本持平,今年可望开始盈利。

缺少一流高校是苏州一大缺陷。有人建议苏州新办一批综合大学。苏州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分析后认为,苏州最为缺乏的人才不是普通劳动者,也不是一般的大学生,而是能够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人才。他们决定: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合作创办一个培养大量创新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为苏州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科技和人才支撑的苏州研究生城。

今年8月29日,占地10平方公里的苏州研究生城在苏州工业园区南侧独墅湖畔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个研究生城将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开发、政府支持、自主办学、运作企业化、后勤社会化”的开发方式,将借助国内各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的教育科研优势,加大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力推进高校科研与高新技术企业的产业合作,促进科研开发与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力争用8—10年时间,使研究生城逐步发展为以研究生培养为主的高等教育基地和高新技术研发基地、苏州市科研产业基地以及引进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和技术以及智力资源的桥梁和载体。

目前,中国科技大学苏州研究生学院、东南大学软件学院、南京大学与美国戴顿大学的一个合作办学项目、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阿灵顿商学院与同济大学合作的EMBA学位项目、苏州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办的苏州大学中新研究生院,以及中美工商管理学院等研究生教育机构已与苏州研究生城签约,并准备入住。

苏州市市长杨卫泽说:“学习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我所用。对待任何经验,说到底,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改编自新华社《内部参考》2002年第75期,作者 钞文 李灿)

思考题:

1. 如何认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创造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2. 以马克思辩证观点分析“苏南模式”由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形式变为进一步发展的枷锁给我们的启示。

3. 从苏南人创造“苏南模式”，到怀疑、突破和放弃“模式”的过程，思考领导干部怎样才能突破模式化思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

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可以说是巨澜翻腾，震动安徽全省。但从全国来说，这只不过是个前哨战。

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

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在这次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二十五项农业政策，强调要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文件提出了纠正分配上平均主义的问题，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接着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产到户仍然是决不允许的，如果连这也想突破，仍然是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

文件规定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广大农民对前两个“可以”不加理睬，纷纷兴高采烈地挑后边的“也可以”大干特干。文件传达后，全国各地联系产量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很快就普遍大幅度地增加了。到春耕时，全国已有 200 万个村的 3 亿农民实行包产到组，把公社化以来属生产队或大队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五六户的小组共同拥有。他们无不心满意足，欢天喜地。

突然，3 月 1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读者张浩的来信，并加上严厉的“编者按”，指责包产到组是“三级半核算”，动摇、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必须立即改正。这已经是比较客气的了，如果在三中全会前一二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跑不掉的。于是，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竟在全国农村中引起了不小的思想动荡。

山东曾派出大批工作组下去纠“偏”，使蓬勃发展的包产到组大大下降，有些地方几乎销声匿迹了。

安徽顶住了这股风。万里说：“三级半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是三级

而不能是四级？我看五级才更好哩！家家户户精打细算，生产会发展得更快。”在这场风波中，只有霍丘等个别县受到影响较大，全省继续大力贯彻“省委六条”，沿着正确的方向大步前进。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蓬勃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明组暗户，包产到户也在逐渐增多。在万里影响下，不少农村领导干部对此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放手让农民到实践中去探索、去创造。有人把肥西山南的包产到户告到中央，万里干脆向中央请示，把它作为正式的试点。

四川省开始在农村中推行生产责任制和让农民修养生息的方针。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竟变为缺粮的省份。实行新方针后生产面貌迅速改变。整个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文革”期间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转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张浩来信事件之后，四川引起过思想混乱，省委为此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通知》肯定了前一段各地积极试行“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的做法是克服平均主义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好办法，要求继续坚决贯彻执行。谁为农民办事，为农民利益说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心里有一杆公平的秤。

贵州省在1978年秋后，有60%左右的生产队自发地搞起了定产到组的责任制，农民积极性很高，效果很好。张浩来信事件之后，有些干部动摇了，到处打听“中央的新精神”，有的还去纠“偏”，给生产造成了损失。贵州日报就此发表了一篇短评：《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农民见了视为珍宝，剪下来放在口袋里，碰到纠“偏”的干部就拿出来同他辩论：“到底是你的道理对还是报上的道理对？”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说：“一年来，农村的局面是一场拔河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他决定要站到那一边去了。

有些省旗帜鲜明地肯定人民公社，反对包产到户。有些省则尽可能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不回答可不可以包产到户，最大胆的也只不过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试。”只要让农民试，结果总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可以说屡试不爽，无一例外。

1979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前一段实践中的反映，修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并正式公布。万里在小组讨论时继续提意见，接着又去找胡耀邦，建议取消两个“不许”。胡耀邦说：“我再去做做工作。”正式公布的文件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面对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比较缓和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开了一条小小的门缝。

以“包产到组，联产计酬”为突破口的广大农民，以后就是从这条小小的门缝里挤出来，掀起包产到户的历史大潮的。

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

1980年包产到户由暗到明，由少而多，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党政各个部门和全国的各个角落，到处议论纷纷。有说：“好得很”的，也有说“糟得很”的，各有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越是领导干部，思想阻力越大。中央部门和省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大多持怀疑态度，有的人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胡耀邦同万里分别到西北、东北各省，一个省一个省地了解情况，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

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在当年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评分田单干导致两极分化；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际是退到单干。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在万里调走后出现了反复。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生怕秋后算帐。当时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面最大，受到的压力也最大。在这个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的地方，又重新成为问题了。

有的认为如果包产到户“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搞不成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

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认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意识，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

在这关键时刻，按照我们国家的惯例，需要有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作出决断。这位权威已由毛泽东变为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他在5月31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热情地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创造，指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这是对包产到户最及时最有利的支持。

8月底，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进行了调整，万里为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他又一次去找胡耀邦，恳切地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是一条出路。但中央文件一直没有个肯定的说法，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变成不合法的事情，这样下去怎么行哪！”

9月14日至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会议争论很大。开始只有任仲